

新群体、新网络与新话语体系的确立 ——以《格致书院课艺》为中心

熊月之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上海 200433）

【摘要】《格致书院课艺》的内容以介绍西学、讨论洋务、批评守旧、呼吁变法为主，包括对于教育制度、政治制度变革的讨论，开设议院的呼声，构成了中法战争以后、甲午战争以前变法思想的新话语，启导了甲午以后的变法思潮。课艺是一项新型文化产品，是以王韬、傅兰雅等居住在沿海城市的中外知识分子，在上海、天津等地开明官绅大力支持下，自觉利用《申报》等新型网络，动员并受到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新式读书人的响应而生产出来的，也是王韬、傅兰雅等人在已有的报刊网络上嵌入中国书院书生长议政传统的结果。课艺西学知识、变法思考极为丰富，成为同光时期西学蓄水池，此前的西学知识、变法思考都汇集到这里，此后的西学知识、变法思考，又多从这里流出。透过课艺所展现出来的思想内容，可以看出甲午前后中国社会思潮的转变，并非壁立千仞式的奇峰突起，而是蜿蜒而上的高原。这对于张灏的“转型时代”说，可以有所修正。

【关键词】格致书院课艺；新群体；新网络；新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6)07-0140-17

翻阅晚清众多的经世文编、新学汇编，会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即许多新学知识、经世文章，细查其来源，都是来自《格致书院课艺》。比如，甘韩主编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1902)，有10篇文章来自此书；何良栋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续编》(1902)，有11篇来自此书；求自强斋主人主编的《皇朝经济文编》(1901)，收录了此书中讨论物理、化学、天文、医学、中西格致异同等问题的文章达20篇之多，占所收同类文章一半以上；陈忠倚主编的《皇朝经世文三编》(1898年)，收录此书文章102篇，竟占全书六分之一以上。

《格致书院课艺》何以会有如此丰富的新学知识，这些知识是如何汇集到课艺中、如何传向社会、形成新的话语体系的？本文对此做一探讨。

一、《格致书院课艺》由来

《格致书院课艺》是上海格致书院学生的课艺汇编。

1885年秋，王韬出任格致书院山长，到1897年5月去世，担任监院长达12年之久。1894年以后，因身体多病，院务基本未管，故实际在任时间是1885年至1894年。所干之事主要是负责书院考课，包括联络命题官员、筹措经费、批阅课卷、将课艺编辑出版。

书院考课之动议，出于傅兰雅。格致书院本以讲求科学知识为主，王韬虽然在西学方面名气很大，但他对于科学知识并不内行。鉴于当时希望了解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知识的人很多，而真正能在这方面投入精力、由浅入深、由粗及精、持续钻

研下去的人又很少，傅兰雅提出，可以通过有奖征文的考课方式，与海内人士结缘，进而促进中国知识界了解、钻研科学知识。他说：中国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几乎全是做文章，这门艺术传承了几个世纪，在文体、选词和组织各方面已达到完美的境界，这是在西方国家从未有过的。“为了使西方知识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必须很好地利用现有的民族特色。因此，可以说做文章是一种能促使上层中国人对外国实用技术进行读、想、写的最有效的方法。借此可以实现格致书院的主要目的。”对于傅兰雅的提议，王韬高度认同。1885年7月，书院正式确立考课制度，决定由王韬出面邀请相关官员，出题课士，并视其优劣，评定甲乙，列前茅者，例拨院款，给以奖励。

1886年春，格致书院对外发布考课章程，载明考课宗旨、内容、考生范围、考课形式、课艺字数、完卷时间、阅卷与评选程序、奖励办法、优秀课艺发表等。章程强调应试者不分地域、不论身份、花红不菲与发表时可用笔名，这与其他书院既限地域、又限身份、花红不多形成鲜明对比。发表时可以用不用真名，也免却了应试士子的立论顾忌。

秉此章程，书院自1886年起，举行一年四季的考课。此后一年春、夏、秋、冬四季正课，均按时举行，直到1894年，连续九年，没有中断。从1889年开始，又增加了春、秋两季的特课，持续到1893年，也没有中断。课艺奖金，一般每次25两，通常奖励优异者前几名，即超等首名10两、二名7两、三名5两、四名2两、五名1两，加奖则由命题人另外提供。例如，1886年冬季加奖银15两，1887年加奖银18两。9年间正课46次，书院花费奖金1135两，命题人提供加奖银两240两2钱、洋钱3552元。其中最丰厚一次，为1893年春季特课，加奖达325元之多，超等首名获银10两加洋钱18元。

课艺命题，有时一次一题，有时一次多题，多至四题、五题，九年间，正课、特课两者相加，总计考课46次，凡89题。共有多少人参加考课，已不得而知。我们仅知道，1886年春有92人参加，1886年秋有83人参加，1888年春有57人参加，其他年份、季节不详。9年中，获超等者418人次，特等者683人次，一等者989人次，三者累计2090人次。k应征士子来自全国近十个省区，包括江苏（含上海）、浙江、广东、安徽、福建、湖南、天津、河南与山东。

这些应试考生中，有的系举人出身，如陈汉章、赵元益、李元鼎、张骏声、蒋宝丰；有的是贡生、监生，如张涵中、左忠训、杨毓辉、孙廷璋、胡家鼎、欧阳骥、柯来泰、李经邦；更多的是府学、县学以及广方言馆等学校的学生。钟天纬、赵元益、李经邦都有出国经历。

应试士子的年龄，由于缺乏确切资料，无法细致分析。但是，从一些零星资料，可以看出年龄分布还是比较宽的，从二十多岁到五十来岁的，都有。其中钟天纬（1840—1900）、赵元益（1840—1902）年纪较大，应试时都是五十来岁，已有丰富的工作经历。许克勤（1847—？）、李经邦（1852—1910）年龄中等，应试时三十大几岁、四十来岁。秦锡田（1861—1940）、叶瀚（1861—1936）、于鬯（1862—1919）、陈汉章（1864—1938）、吴昌绶（1868—1924）、项藻馨（1873—1957）等人年纪较轻，应试时二十几岁、三十来岁。

从1886年至1894年，书院将课艺佳作逐年刊行。入选课艺一般在考课次年编辑出版，也有拖延较长时间的。1893年以前之课艺均由王韬选印。1894年之课艺，由赵元益选印。9年中，课艺刊出者181人次，涉及88人，共345篇文章，分编为15册。其中，1886年至1888年，每年一册，1889年以后，因有特课、正课两种，分量加重，故每年分为两册。1895年以后至1900年，由于时局动荡，加上傅兰雅于1896年赴美，王韬生病，杜门不出，格致书院业务大受影响，考课时有中断。1901年8月，潘慎文接任荣誉监院以后，谋求整顿，另订新章，改革考课制度，分为师课与官课两种，但课艺没有汇集出版。

从现存课艺看，王韬、傅兰雅以及各位命题、阅卷人，对课艺采取的是只加评论、眉批，不予改动的方式；对课艺等第的评定，只问其是否言之成理、自成一说，不问其观点是否合乎阅卷人本人的见解。在课艺的评语和眉批中，随处可以见到他们对学生意见的反驳、对修词文法的批评。这种只评不改的存真态度，使得今人可以看到当年学生课艺的真实面目。

二、西学蓄水池

《格致书院课艺》关于西学议题众多，学生课艺繁富，涉及今天学科分类的各个方面，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工程技术等。综合考察这些课艺，可以大致地看出当时读书人对于西学了解的整体面貌，以及对于各门具体西学知识的知晓程度。

先看当时读书人对于西学了解的整体面貌。

1889年，李鸿章出题，让士子叙述从古希腊到近代西方科学发展的历程，蒋同寅、王佐才等30人获奖。他们从亚里士多德、培根，到达尔文、斯宾塞，叙其生平，述其业绩，旁征博引，娓娓道来。他们提到的，还有一般人不太熟悉的一大批科技人物，例如，制风雨表的意大利人多利遮里，查出光速的丹麦人美尔，同测获压力比例法的物理学家英国人拜勒、法国人马略德，人体解剖学家法国人举非，植物学家法国人遵赖氏，博物学家瑞典人邻奈，发现氢气的化学家英国人加芬底矢，查得氧气的科学家伯理司理，埃及医学家埃斯古拉伯、希波拉底，测得血脉周行人身确证的英国医学家哈斐，等等。

从应试士子对西方各门学科的形成、演变，对各位重要科学家的生平事迹、学术贡献的评价上可以看出，他们明其源流，知其界限，知道谁是代表人物，具体贡献为何。

比如，朱澄叙的课卷，清晰地叙述了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培根、牛顿再到达尔文、斯宾塞的发展脉络，准确地叙述了电学、化学、光学、重学（力学）、生理学、植物学、医学、代数学、几何学等学科的形成特点及其代表人情况，对于培根、牛顿等近代大科学家的贡献，着墨尤多。课卷用一大段话介绍培根的划时代贡献，认为培根的著作，“皆更易古昔之遗传，而新其义理，探求天地万物之底蕴，而显其功用，分条析缕，正喻互用，不下数万言。当书之初成，颇形扞格，迨后屡试屡验，如风象、天气、养生术、星学、医学等皆是。由此前说尽辟，其学始精。”再比如，钟天纬的课卷，大处落墨，有介绍，有概括，重点突出，简略而准确地介绍了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文称，西国理学，初创自希腊，分为三类：一曰格致理学，乃明征天地万物形质之理；一曰性理学，乃明征人一身备有伦常之理；一曰论辩理学，乃明征人以言别是非之理。文章首先介绍了亚里斯多德的生平及其学术成就，称其为“格致之大家、西学之始祖”；随后介绍了英国大学者培根的生平其学术成就，认为其在西方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著诸书，原原本本，具有根柢。儒士见之，宛如漆室一灯”；再后介绍了达尔文、斯宾塞的生平其学术成就，认为自达尔文学说问世之后，“格致学从此大为改变”。

在此以前的任何一本中译西书中，无论是传教士的出版物，还是江南制造局等机构的西学书籍，都找不到如此系统的介绍。这说明，这些作者是在广泛阅读各种西书，或在格致书院听讲以后，经过自己消化、整理，然后写出的。治科技史、思想史的学者，现已注意到钟天纬等人的这些文字，视其为近代中国较早介绍培根、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生平、学术的重要资料。

许多课卷清楚地显示出，应试学生对当时中国译书情况，了如指掌。1889年春，龚照瑗出题，让学生评价中国翻译的西书，有37名学生获奖。从刊出课卷可以看出，不少学生对西书相当熟悉，其西学素养，决不在人们所熟知的后来成名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之下。获超等第一名的孙维新，课卷近一万字，洋洋洒洒，气势恢宏。他在评述译书界的情况时，共评论了160多本西学书籍，举凡算学、重学、天学、地学、地理、矿学、化学、电学、光学、热学、水学、气学、医学、画学、植物学、动物学，罗列无遗。对每门学科的译书，都举其要者，品评优劣。超等第二名车善呈、超等第三名钟天纬的课卷也很了得。车善呈在分门别类地介绍各种翻译西书的同时，还介绍了各种译书机构与译书人，介绍了自利玛窦、徐光启至伟烈亚力、李善兰等译者的具体情况；在介绍各种西书影响时，还指出了一些西书存在的问题。比如，他指出，《海道图说》一书，虽然给人以丰富的海道知识，但也存在严重缺陷，书中对于“南洋各岛至新嘉坡、孟加拉、印度洋、新旧金山及欧、俄、美各国海岛口，均未载入，则是书虽详而实略，得者近而失者远也”。龚照瑗评论这一课卷：“作者于西学诸书，皆能贯通综核，论列详明，一一指其实用之所在，洵于此道三折肱矣，亦当今西学中未易才也”。钟天纬评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京师同文馆译书的特点，说“京师所译者，多交涉、公法之书，上海所译者，多工艺制造之事”。用语不多，但大处着眼，相当到位。

1894年夏，宁绍台道吴引孙命题，让学生概述外国书籍出版与收藏情况，要求他们介绍中国已译西书之外的情况。这是一道考验学生西学真功夫的高难度题目。获超等第一名的杨毓辉，列出西学书籍532种，都是当时没有中文译本的。他将这些书

列为 11 类，包括史学 55 种，法学 70 种，经学 9 种，理学 9 种，算学 26 种，地学 141 种，兵学 65 种，文学 62 种，艺学 36 种，医学 41 种，农学 18 种。每一种均列出书名、作者、卷数、特点，有些书还予以重点介绍。课卷介绍培根的《格致新理》：“英人贝根撰，共分七类：一、《天地阐义》，凡三十七条；二、《方寸意像》，凡二十四条；三、《格物诸理》，凡九条；四、《格物差谬》，凡七条；五、《格物谬因》，凡十五条；六、《格物学渐兴之基》，凡三十三条；七、《天地阐义新法》，凡十五条。遗糟粕而辟新机，格致之学始盛”。介绍《西国百年大事记》：“英人麦恩西撰，记百十年来，西国富强，皆由振兴得法，如制造等事也。今闻李提摩太将欲译成华文”。这本书就是稍后翻译成中文的风行一时的《泰西新史揽要》。在课卷中，杨毓辉特地声明，所列之书，均是其亲自目击，“就管窥所及，将未经翻译之书，择其切要者，订为简明目录”。对于杨的课卷，上海道刘麒祥给予很高评价：“殚见洽闻，深于西学，体例亦极精详，可称博雅之士”。获超等第二名王辅才的课卷，将已译与未译的西书，综合分类，即天类，包括天算、测候等，凡 37 种；地类，包括舆地、邦国、山水等，凡 62 种；人类，包括政事、文史、诗词、格致等，凡 182 种；物类，专言器具方面，凡 31 种。四类总共收书 312 种。这种分类相当别致，所收书目，颇多没有译成中文的，如英国所出的《邦国条例》《英国诗录》，法国的《通融公法》，德国的《欧洲公法》，美国的《美国律例》，俄国的《俄国文编》。

再看当时读书人对于各门具体西学知识的知晓程度。

应试课艺对于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与地质学、医学与农学等，都有述及。

数学方面，除了上文已经述及的内容，李鸿章还在 1891 年春出过关于《周髀算经》与西法平弧三角相近说的题目，要学生对中西数学进行比较。朱正元、林季贤等人的课卷很有深度。对于超等第一名朱正元的课卷，李鸿章评价：“抉西法之精华，作六艺之注脚，明道经世，断推此种文字。”王韬评价：“作者于中西天算之学，俱能融会变通，既援古以证今，复即今以求古，知于此道三折肱矣，非向壁虚造者所能道只字。”

物理学在当时包括重学（力学）、声学、热学、光学、电学等，重学述及抛物线原理，化学则述及元素、杂质、化学反应等方面知识。1890 年（庚寅）春季特课，李鸿章出了三道题，涉及化学元素命名、物理量测量、电化学电解质等问题，涵盖了当时所知的物理学、化学的基本知识。从课艺可以看出，杨毓辉等人已经明白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种物理、化学知识，已知道声波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声波速度的测定方法、音频及其测定方法；明白气温不同，金属热度不同，声波的传输速度也不同；知晓光的基本形态和光的传播速度，知道光波、光的反射、折射及折射率的测定，懂得各种透镜的光学原理；知晓电的分类、电的特性、导电速度和测电之法；明白热源和热传导的基本原理和测热之法；明白元素分为六十四种，其中非金属十五种，金属四十九种，知道每个元素的存在、制法、性质、用途、主要化合物等方面知识；已经懂得通过不同实验方法了解水、盐类、酸经电流电解得到的现象和结果，分类总结了各种物质电解得到的不同结果，介绍了电镀防锈的方法。对于杨毓辉的这份课卷，王韬的评价是：“考据详明，言有条贯，知其寝馈于西学也深矣。”李鸿章评价：“遣词肖公、谷，说理近楞严，此才殊非易易。”公、谷，指《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均为解读《春秋》的经典；楞严，《楞严经》，大乘佛教经典。李鸿章将杨毓辉课卷的遣词、说理与那些世所公认的经典并提，可见评价之高。

天文学、气象学方面，应试士子已明白产生潮汐的原因是日月对海水的吸引，且月之吸力大于日之吸力；介绍了意大利科学家托里拆利通过实验获得大气压数，有了基本的大气环流知识。

地理学与地质学方面，课艺介绍了五大洋的知识，介绍了各大洋的地理位置、面积深度、气候、源流、岛屿、物产等情况；明白上海地理状况，知晓帕米尔高原地理概况。地图测绘方面，课艺显示出，随着西方地图测绘理论的东传，中国学者已开始将传统的测绘学与西方近代测学结合起来，试图创立一套新的测绘理论和方法。

医学方面，1892 年秋两江总督刘坤一、1893 年夏宁绍台道吴引孙所出题目，均涉及比较中西医短长问题。许克勤、叶瀚等人在课艺中介绍了自合信、嘉约翰、柯为良等翻译或撰写的西医著作，介绍西洋医学的历史，介绍了西方医学重要代表人物希波克拉底、哈维等的成就，并对中西医的短长做了比较。他们认为，“中医惟尚乎王道，西医每矜乎霸功”。中西医理各有所长。

以内外言，中医长于内，西医长于外。华医之药多平和，西医之药多猛烈，治膏粱之体为华医所长，而治藜藿之躯乃西医所长。就得失而言，“中医失之庸，西医失之霸。中正和平，中医得之，体验详确，西医得之。中西之医学，得亦半失亦半也”。但是，归根究底，中医西医，总有一定之规与相通之处，“有定者，医之理也；无定者，医之法也。法多西医擅胜，理恒中医见长”。他们主张取长补短，通过汇通寻求中国医学发展。

农学方面，1892年秋刘坤一所命之题，关于水稻品种与种植问题，可视为专门性农学题目。学生们根据古今中外各种典籍以及所知晓的农业知识，详细地讨论了各种各样的水稻品种及其栽培技术。超等第一名许克勤的课卷，详细地介绍了各种水稻的性能，述及的不同水稻品种名称便有早禾、晚禾、山禾、两熟稻、蝉鸣稻、白汉稻、青芋稻、红广粳、红霞米、胭脂赤、高田稻等。课卷介绍了不同地域、不同气候、不同品种水稻的栽培技术，对于防旱问题，论述尤详。许克勤对甘薯的种植及其备荒价值，也做了特别介绍。对于许克勤的课卷，刘坤一与王韬评价都很高。刘的评语是：“首辨稻种及树艺之法，曲折详尽，其备水旱四端，确有见地，均可采用。”王韬特别肯定作者提出的仿效西法引进机器以兴农业、备灾荒的想法，认为将机器引入农业，“可不劳而多获”。

据研究，《格致书院课艺》征引各种书籍凡254种。这些书籍，不完全是西学，但绝大部分是西学，它们包括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译介进来的西学、鸦片战争以前马礼逊、郭实腊等新教传教士在南洋翻译的西书，更多的是鸦片战争以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等机构翻译、出版的西书。笔者多年留心搜集晚清西学书目，包括傅兰雅编的《译书事略》，梁启超编的《西学书目表》（时务报馆，1896年），沈桐生编的《东西学书录提要总叙》（读有用书斋，1897年），黄庆澄编的《中西普通书目表》（上海算学报馆，1898年），徐维则编的《东西学书录》（1899年出版，三年后又出版《增版东西学书录》），赵惟熙编的《西学书目答问》（1901年），中国学塾会编的《中国学塾会书目》（1903年），沈兆祜编的《新学书目提要》（上海通雅书局，1904年），陈洙编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1909年），顾燮光编的《译书经眼录》（杭州金佳石好楼，1934年）。这些西学书目的编者，都是晚清时期高度留心西学的学者，都尽其所能地搜集了各种西书。但是，以《格致书院课艺》所征引的西书与这么多书目相对照，还是可以发现有些西书是这些书目所没有收入的。比如，课艺征引的舒高第所编《医学总论》，传教士所编《益智新录》杂志（1876—1878），还有《动物类编》（光绪八年）、《联邦南北战编》（未注编者与出版信息）、《秘智海战纪》（未注编者与出版信息），这些西书在上述书目中均未收录。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格致书院应试学生涉及的西书是何其广泛！

西学输入以后，中国社会反应形形色色，欢迎的，反对的，疑信参半的，中体西用说，西学中源说，礼失求野说，等等。《格致书院课艺》如同全息摄影，将这些反应保存下来。

西学输入以后，力主改革的人们对它持热烈欢迎的态度，希望通过引进西学，强国富民，推动中国的进步。从魏源的师夷呼吁，到冯桂芬的采西学议，都是这种心态的表露。在《格致书院课艺》中，这种心态表现得更集中、更迫切：

泰西各国学问，亦不一其途，举凡天文、地理、机器、历算，医、化、矿、重，光、热、声、电诸学，实试实验，确有把握，已不如空虚之谈。而自格致之学一出，包罗一切，举古人学问之芜杂一扫而空，直足合中外而一贯。盖格致学者，事事求其实际，滴滴归其本源，发造化未泄之苞符，寻圣人不传之坠绪，譬如漆室幽暗而忽燃一灯，天地晦冥而皎然日出。自有此学而凡兵农礼乐政刑教化，皆以格致为基，是以国无不富而兵无不强，利无不兴而弊无不剔。

这种议论，堪称典型的西学救国论。

西学传入以后，对中国传统学问、固有观念形成强烈冲击，有些本属于臆想、猜测、经不起推敲的传统观念，便被西方科学观念所取代，诸如天圆地方之类。这在课艺中多有反映。有份课卷写道：“昔战国时，邹衍好谈天，谓宇宙外复有宇宙，中国仅居九九八十一分之一。汉张骞自谓泛海寻河源，至天边，获支机石而返，人皆信以为真。至于今，始知其谬。盖地球之说，莫详于西书，而天下只有五大洲，并无九九八十一分之说。至张骞乘槎之事，尤属虚渺无凭，可见载籍之不可尽据也。”

有的学生在对西学表示欢迎态度的同时，对西书中的某些观点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谈天》等西书，每每言及彗星运行自有轨道，与人世无涉。有位学生认为，这个说法于理不通：“至谓彗星无与于灾异，何以往史所言，彗出而天下必有事变？使人君及早警戒，尚可消患于未形。果若《谈天》所言，适足启人主之纵肆，而天变亦不足畏矣。以是而论，《谈天》一书，其日躔月离、平行经纬度分定率，亦足资授时之用，而其悖理妄诞之见，学者不可不深察而决去之也。”认真分析而不迷信西学，那怕是西方名著也不迷信，这本是一个严肃学者的应有品质，在西方文化大量涌来之时，这种精神尤其值得提倡。彗星出现与地球上的人事有没有关系？这在科学昌明之 19 世纪末叶，早已不是一个问题。此君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确有关系，那可是了不得的发现。没有证据，只是因为古人这么说过，便硬说有关系，这就圆凿方枘，体现的恰恰是东方天人合一思想传统对近代科学的顽固排拒。

西学中源论是晚清讨论中西文化关系时最为流行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西方许多科学技术源出中国。这种说法在课艺中随处可见。

有的课卷认为，西方之几何学、自鸣钟、火车、大炮等，其源头皆出自中国：“制器尚象，利用本出于前民。几何作于冉子，而中国失其书，西人习之，遂精算术；自鸣钟创于僧人，而中国失其法，西人习之，遂精制造；火车本唐一行水激铜轮自转之法，今则火蒸汽运，名曰汽车；炮本虞允文遗制，当时败敌，有霹雳之名。凡西人所精者，中国皆先有其说。今愚俗之少见多怪，往往震惊西人之巧，岂西人之巧、西人之智真远出于华人上哉？特中国不重技艺之学，人巧而吾自安于拙，人智而吾自安于愚耳！”

不止一个人说，西方科学中的所谓电学、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测算学，无不源于中国经典：

《大学》之言格致，具见于《易》《诗》《书》《春秋》之中。《易》言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百物露生。则电学所由祖也。《尧典》四仲中星之次，璇玑玉衡之仪，则天学所由祖也。《毛诗》之草木鸟兽，虫鱼琐屑，则动物、植物之学所由祖也。《春秋》之日食月蚀，星陨岁差，则测算之学所由祖也。是格致之学，何莫非圣人启其先！

上古之中国，道与器并重，故器用日备。秦汉以后之中国，重道而轻器，故艺事不能加精。皇古之世，睹飞蓬而作帆，观蛛丝而作网，取火以钻燧，克敌以弓矢，其创制之精，蒙不具论。即以唐虞时考之，弃作后稷，精于植物学者也；益作朕虞，精于动物学者也；皋陶作士，精于律学者也；后夔典乐，精于声学者也；垂作共工，精于重学者也；授时之羲和，精于天算者也；治水之伯禹，精于地理而兼测量者也；观兖州之筐以织文，扬州之筐以织贝，知纺织之利溥；观荆扬之贡金银铜，梁州之贡铁银镂，知开矿之利饶。降及成周，虽醯醢之细，医卜之杂，莫不设有专家。《周礼》一书可考已。

西学中源论因其内蕴的丰富性，带来解释的多样性，从而导致了问题的复杂性。首先，西方有些科学技术确实源于中国。诸如人们所熟知的火药、指南针、造纸术，等等。其次，由于世界文化是多元创造而来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方可能独立发明、创造出类似的技术、器物。后人以一元创造理论对此多元创造现象进行解释，于理亦有可通之处。第三，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可以假此说以廓清障碍。因为既然西学源于中国，那么，取法西学，便不是以夷变夏，而是恢复旧物。第四，反对学习西方的人，可假此说以阻挠变革。因为既然连西学也是出于中国，那说明中华文化确实欹欹盛哉，中国人只要钻研自己老祖宗的东西，便足以驾而上之，何必不求其源反而逐其流乎！第五，有相当一批读书人，并不是出于要学习西方或反对学习西方的目的，而只是因为他们太熟悉中国文化典籍，在接触到陌生的西学以后，自然而然地进入以古附今、以中附西的思维定势。他们确实认为西学源出中国。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西学中源论成为左右逢源、人皆可用的理论。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都有这方面的议论。这也是这种说法在格致书院课艺相当丰富的原因所在。

人们可以举出千条证据、万条材料，说明中学与西学有相同、相通之处，但谁都不否认其间的巨大差异。差异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些差异是怎么产生的？课艺中有不少内容涉及这些问题。

对于儒家经典中“格物致知”一语中的“格致”究竟作何解释？中国的格致与西方的科学究竟是不是一回事？李鸿章就此

出了一道课题。有些课卷从义理与物理的区别上，说明两者的差异，认为儒家所谓之格致，“乃义理之格致，而非物理之格致也。中国重道轻艺，凡纲常法度、礼乐教化，无不阐发精微，不留余蕴，虽圣人复起，亦不能有加。惟物理之精粗，诚有相形见绌者”。这方面讲得最细致的是朱澄叙。他从中西格致的对象、途径与终极目标的差异性对这一问题做了分析：

先儒意主穷理，非泛然逐物而格之，西学则举万物之形质，究察其底里，明辨其异同，且更以调和交感之法加于物，分之而得其纯一之体质，合之而得其变化之因由，几欲尽天地万物而一一格之焉。先儒格致工夫，明指天下、国家、身心意，即是物，致知工夫即在此处。其所以必先格物者，盖即一物之理，以通万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以穷天下之理。是致知必先格物也。西学格致，如论水知为养气、轻气合而成，论火知为养气、炭气合而成，论木知必有养、轻、炭三气合而成。是早知养气、轻气、炭气各具一质，而后能究其所以相合。故格物必先致知。

基于这一分析，朱澄叙断然否认西学源于中国说，明确认为西学是中学之外另一文化体系，“今泰西一切制作，远不过二千年，虽非窃我绪余，其实遥遥相继，不必谓西学天文同于中国浑天之说，地学同于《书考灵曜》地恒动不止之说，化学同于《洪范》五行及墨子、张子、亢仓子之说，电学同于《淮南子》阴阳相薄之说，声学同于闻牛鸣而知宫、离群羊而知商、听雉登木鸣而知角、见豕负途骇而知微、听鸣鸟在树而知羽等说，重学同于墨子均发均悬等说也”。

有些课卷仔细分析中西学术异趋的由来与发展，认为中学、西学本来同源，各门西学的源头，在中国传统学问都能找到，但是，后来的发展，各有侧重，中国学问重义理，重视形而上，但也不是完全忽略技艺，不是完全忽略形而下。蒋同寅就从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中，找出一大堆例证，证明这一论点。他说，就经书而言，《易》言辩物，《书》言勤小物，《诗》言物则，推之三礼、三传诸经，大体上都是以博物为贵。古人格物之“格”，应当解释为“至”字，格物即至物。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学之有合于经”，是完全说得通的。再看史书，中国传统编史，具有体裁，传记而外多有志表，如天文、地理、五行、沟洫、礼乐、艺文之类，原原本本，殚见洽闻，这与西人关注技艺与形而下问题，异曲同工。这说明“古史之所究心者，皆西人之所加意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西人之能知史学也，亦无不可”。再看子、集两部，如《淮南子》《抱朴子》等书，多言名象问题，这自不用说，即使古代大儒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这些人都是尚义理而细训诂的大学者，但是仔细研读《周子通书》《程子遗书》《张子正蒙》《朱子语类》等书，可以发现，他们在研究义理之余，“莫不工于体物”，对形而下的学问也很用心，而邵康节之《皇极经世》蔡元定之《律吕新书》，尤为观物而明于象数者。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西人的学问，与中国的子、集，也是相通的。“要之，物有本末，尤贵知所先后。古昔大儒以格致为开物之资，故形上为道，而务求其本；西人以格致为阐物之源，故形下为器，而但求其末。如欲本末兼赅，则当以中学为纲，而以西学为目，二者兼资而并用之，庶几无逐末之讥欤？”

这一见解相当有价值。从相通的角度，讨论中西文化关系，这是立于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高度，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放在对等的位置，较之拘泥于源流之辨，体现的是更为博大的胸怀、开放的心态与高远的目光。

有的课卷寻根究底，追索中学与西学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一位学生这样写道：

中西相合者系偶然之迹，中西不合者乃趋向之歧。此其故，由于中国每尊古而薄今，视古人为万不可及，往往墨守成法而不知变通；西人喜新而厌故，视学问为后来居上，往往求胜于前人而务求实际。此中西格致之所由分也。

以“中国每尊古而薄今”“西人喜新而厌故”，来概括中西文化之差异，赞扬西方文化“往往求胜于前人而务求实际”，这类见解，在五四以后，已是陈独秀等人的口头禅，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在严复、梁启超那里，也很常见，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能从文化传统、价值取向上分析中西文化的差异，实属罕见。

三、讨论洋务，呼吁变法

格致书院有奖征文进行得热火朝天之时，正是洋务运动向纵深发展之日。一方面，开矿、炼铁、造铁路、架电线、办海军，

派遣大批人员出国考察，种种洋务实业方兴未艾，另一方面，各种批评、反对洋务的声音，断续而来，一度甚嚣尘上，西学教育、铁路建设等问题都争论得不亦乐乎。课艺命题人，无论是南北洋大臣，还是管理海关的各道台，都是洋务运动的热忱鼓吹者与积极践行者。关于洋务的题目，一直是格致书院课卷讨论的重心。李鸿章的中国茶与印度茶竞争问题，曾国荃的铸银币得失论，刘坤一的关于上海海口形势、舆图广袤问题，沈秉成的丝茶烟布合论，盛宣怀的轮船、铁路、邮政问题，汉阳铁厂基炉座、大冶矿苗、纺织厂布局问题，聂缉槩的设立银行利弊论，周馥的中国讲求富强之术当以何者为先论，郑观应的泰西技艺分类问题，龚照瑗的中国创行铁路利弊论，吴引孙的筹节餉项问题，薛福成的造船修船问题、丝茶出口问题，诸如此类，形形色色，都是洋务运动中的热点问题或实际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应试士子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解答，提出了丰富多彩的设想。

从总体上说，他们都赞成开矿藏、修铁路、兴航运、办银行、通邮政、练海军、强国防，都积极拥护发展工商实业，反对固守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诸多士子认为，通商为利国利民第一要着，泰西各国均恃此而臻于富强。“自来讲富强之术者，必富列于先，而强列于后。诚以国既富，斯能强，国既不富，强于何有？当此而欲使中国强，必先使中国富；欲使中国富，必先振兴商务。余故曰：商务之兴废，国家盛衰系之也。”他们指出，自从中外通商以后，口岸越开越多，与外国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无论如何再也无法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国既不能禁止丝茶之出口，也无法禁止洋布等洋货之输入。“为今计，欲闭关谢客，虽汉武、唐宗复生于世，亦势有所不能，惟有兴中国之商务，以夺外国之利权，庶足以敌之。若犹是重农轻商，不知变计，将来筋疲力尽，欲战无可募之兵，欲和无可赔之餉，惟有拱手受约，惟命自从，有不为印度、爪哇、越南、缅甸之续哉！”中国非但不应禁止通商，而且应该大力发展工商，支持通商。

鉴于当时中国工商不振，外贸逆差，严重影响国计民生，应试学生提出种种振兴工商的方案。他们认为，西方行之有效的各种有助于发展工商的举措，都可以引进、实行，诸如银行、保险、邮政、电报，也包括政府管理部门的设立。他们指出，西方各国工商并重，特设专部，经理其事，故利权独揽。中国应吸取西方管理工商的精髓，宜由南洋大臣与北洋大臣，这两个实际管理通商事务的高官，“于年终时，会同税务司，将此一年内贸易情形，详加考核，凡税银之盈绌，商货之盛衰，反复推求，务得其要。如有商情不便者，许其陈诉，据实转请两大臣设法保护，开其利源”。他们认为，中国应该设立商部，专管制造、贸易事务，务以拓兴中国工商生计，为其专责。有些士子还提出，中国应该仿照西方，建立商会，沟通商情，维持商务，使得官商一气，呼吸灵通。其具体办法可以在通商各口，设立华洋商会，“以洋务委员总其事，邀集各华商，一月数次，晓以目前进口洋货何者为多，何者为少，出口土货孰则为减，孰则为增，进口多者当设法仿制，出口减者，当设法防弊，务使进出持平，且出多于进，然后利不外散，商务大兴！”

当时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不利位置，其中有一些属于制度性问题，诸如不平等条约对洋商的保护，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有利于列强协同对付中国，关税政策有利于洋商、不利于华商，总税务司位置被洋人占据，厘金制度加重了华商的负担，对此，应试士子提出许多改进设想。其中包括修改中外约章、提高进口税、减厘恤商、与洋商争夺利权、拓展海外市场。

洋务运动的开展，一直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反对声音，开办外语学校有人反对，派遣留学生有人反对，开通轮船有人反对，架设电报线有人反对。其中，最典型的是围绕着铁路问题的争论。格致书院的应试士子也参与了这些争论。

1880年底，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奉诏进京筹议抗俄军务，力倡在中国内地修筑铁路。他的奏折，代表了李鸿章等许多洋务派的意见。朝廷将此事交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刘坤一等妥议具奏。李、刘复奏，均赞成先修清江至北京一路。此时，反对修筑铁路的声音依然很大，其中最为系统的是刘锡鸿。他在奏折中论述火车“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一共25条。作为曾经担任驻英副使、驻德公使的刘锡鸿，对西方火车铁路有切身经历和体验。他的意见，朝廷特别重视。他的奏折上呈第二天，朝廷即下谕旨：“刘铭传所奏，著无庸议。”这么一来，刘铭传的意见就被弃置一旁，刘锡鸿的意见，也就成为那时反对修筑铁路最为系统、最具代表性的声音。二刘之争，是晚清中国铁路争论史上著名事件。

1886年，上海道龚照瑗出了一道《中国创设铁路利弊论》，让学生作文。获得超等前三名的王佐才、张涵中、秦锡田，都力陈修筑铁路之利、不修铁路之弊，力驳反对修筑铁路之谬。特别是王佐才的课卷，点名批驳刘锡鸿的观点，将刘的意见悉数列

出，一一批驳。对于王佐才课卷，龚照璠、王韬都给予极高评价。龚照璠评论：“铁路议兴久矣！以李、左、刘诸巨公之力请，卒尼于参议一疏，时会固未至欤！此篇逐款辩驳，隽快绝伦。虽措词容有未当处，然当时果有以此议折之者，未必不为诸巨公之一助也！英词卓识，固应辟易千人！”王韬评论：“铁路将来必兴于中国，特在迟速之间耳！再数十年，洋务日明，人才日出，所行岂特铁路已哉！此文层层勘入，如剥蕉心，快人快语，海内罕见斯人。王佐之才，其自道欤？”

洋务运动中，教育改革是一大议题，也是阻力重重、进展缓慢的问题。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批评科举制度，二是兴办新式学校，或是对传统书院进行改革。冯桂芬、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人在这方面都有相当丰富的思想，李鸿章等人则既有议论，也有不少创新实践。经过千呼万唤，清政府终于在1888年同意戊子乡试中特开算学一科，并按二十比一的比例录取了一人。那年报名者32人，照章取中1名。虽然只取了一人，但这是对传统科举制度的突破，在当时影响很大，激起了时人改良科举制度的热情。格致书院师生也参与了相关讨论。1893年秋刘坤一所出题目，就要求学生对比中西教育制度；1894年冬，郑观应所出题目，则明确要求讨论“科考与取士于学校之法孰优”。应试士子无不对科举制度之不适当当前形势、空疏无用、误人害国进行尖锐批评，也提出诸多改进设想。其中，来自苏州的潘敦先提出推广书院、道艺兼重、建立游艺书院的设想，特别有价值。潘敦先主张的实质，是保留科举制度大框架，以渐进方式，加进适应时代需要的科学内涵，从而可以使得改革成本较低，社会震荡幅度较小。可惜的是，这一方案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十多年后，清政府采取的是断然废除科举的方法，结果引起那么强烈的社会震荡。

书院课艺有一部分涉及政治与法律改革问题，比如刘坤一的比较中西律例异同得失问题，周馥的中国近日讲求富强之术当以何者为先论，裴式模的中国各大宪选派办理洋务人员应以何者为称职论，吴引孙的中外各国刑律轻重宽严异同得失考、请永停捐输实官议，郑观应的议院论。这些都是当时思想界王韬、郑观应、陈炽等人热议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改革过程中的难题。学生们在解答这些问题时，展现了他们相当广博的政治与法律知识，对于司法改革与政治改革问题的深刻理解。

法律方面，他们高度肯定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充分肯定西方法治精神。王佐才认为：

泰西政教修明，民生熙皞，国势日增富强，无不归功于君民共政，而不知其枢纽实操诸律法，乃能公道常伸，有以维持于不敝，此则西制之善也。盖泰西通例，国之律法最尊，而君次之，君亦受辖于律法之下，但能奉法而行，不能威权自恣。而国之律法，则本亿兆公议所定，君之威权即本亿兆公助而成，是以君权虽有所限制，而反能常保尊荣，民情得以自伸，不致受困于虐政，则不必袭揖让之虚文，而阴已得官天下之实际。此则国势强弱、民生休戚之大关键也。

考生们明确认为，中国也只有走这条路，才能臻于富强。“中国欲参公议，必先自重律法始；欲重律法，必先崇奉国家大律师始。盖大律师者，国家执法之人，即皋陶之士也。”

学生们具体介绍了西方司法制度及一些具体法律情况，比较了中国与西方在立法、司法方面的差异，对于审讯、对待犯人与律师制度等方面，关注尤多。

他们注意到，西方法律无滥刑之弊：西律审讯案件，俱凭人证，从无刑讯之条。又有陪审官员，事有不平，由陪审官员公同议断。西方处置犯人，罚款监禁而外，至重不过缙首，所谓缙首者，略与中国之绞罪，从未有身首异处之极刑。西方在审讯时，无威吓逼勒之虞，无缙继银铛之苦，牢狱亦亢燥洁净。中国则不然，残酷无比。

政治制度方面，他们高度肯定西方官场用人制度。项藻馨注意到，中西官制至少有四大不同：一是西国中央部门专官专任，各部门官员均使用熟悉该部门知识与技术的专门人才。二是西国地方官员悉由民选，或三年为期，或一二年为一任，上下之交既无隔阂，与民情志息息相通，所征赋税出入之数，岁一核稽，官无私焉。官之所为，悉顺舆情。这与中国地方官员的产生也是截然不同的。三是西方官员廉洁，没有仪敬陋规，与中国截然不同。四是西国各类专门官员，均须经过专门的教育与培训，而中国情形与西国恰恰相反。

1886年秋，周馥以“中国近日讲求富强之术以何者为先论”，命学生作文。王佐才特地将“参公议”作为富国强兵之重要途径提出来。他所说的“参公议”，就是仿照泰西议院，通过渐进途径，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议会制度。其具体设想是：“改内阁为公议院，而以王大臣领之，凡部科皆属焉。再举地方之绅士，或公车之举人，考其事理明白、议论宏通者，每州县考取一二人留京，各驻于该州县之会馆，有事即集于总会馆，如各处地方利弊、民生疾苦，亦准其据实上陈，即有势豪不法，官吏贪婪为害閭阎者，亦许该员参劾。如此则民隐纤悉上闻，輿情委曲得达，而上下无壅隔之弊矣”。

1893年冬，郑观应让格致书院学生做一道议院论。许象枢、杨史彬、陈翼为的课卷分别被评为超等第一、第二、第三名。这三人都认为议院制度是泰西富强之本，而中国要富强就非设议院不可，都主张中国行君民共主制而不是民主共和制。三人的课卷也各有特色。

许象枢列陈中国开议院七利，从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在中国开设议院的必要性。他还预料中国有五种人阻挠开议院，包括因开议院而利益受损的部臣、内外臣工、提镇以下诸武弁、各省闲散人员与一部分无知百姓。他分析了开议院与各种人实际利益的冲突，一一揭示了这五种人反对开设议院的物质原因和思想原因。许象枢的课卷深受郑观应、王韬等人的赏识，被评为超等第一名。郑观应的评语是：“熟悉人情，深究物理，于中外古今各学均能洞彻本原，用笔亦疏畅通达。”王韬的评语是：“按切时势以立言，明彻四际，洞垣一方，非由平日留心世务，蒿目时艰，安得臻此。”郑观应日后把许象枢的课卷全文辑入了《盛世危言》中。

杨史彬采用辩难文体，从十个方面系统驳斥了所谓中国不必开议院、中国不能开议院、中国无法开议院等守旧论调。这十个方面包括：（一）开议院“则君无权，官无权，而权在议员”，于是，倒行逆施之弊就会发生；（二）议院乃泰西之物，中国开议院，系用夷变夏，贤者所耻；（三）开议院，步西人后尘，将为西人所轻视，有害无利；（四）开议院，倘如法、美，不免弊端百出；（五）俄国彼得大帝，曾私访欧洲各国，凡各国有利之图，无不仿行，独不立议院，如果议院确实好，他为什么不仿行呢？所以中国也根本不必设议院；（六）中国幅员广阔，不同于西方，即使开设议院，也难通下情；（七）西方议院，实权操于少数宰辅，君与民均无权，“所利者官耳，君民有何利哉？”（八）苟立议院，议员薪俸是个不小数字，时事多艰，筹款不易，这笔钱从何而来？（九）在中国，“天下之利，御史得据事直陈；天下之害，御史可危言相阻，是言官之设，利益良多，何须再立议院，以滋流弊乎？”（十）利不大不图，利不远不为，“议院之设，果能大而远乎？”对这十条，杨史彬一一进行了辩难，论述了中国开议院的重要性、可能性。

陈翼为议院论的特点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紧扣人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这个问题，论证中国开设议院的历史必然性和极端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应沿着民主—专制—再民主这样一条道路前进。上古三代本是民主的，君本系民所立，亦听命于民，尧之举舜，舜之举禹，皆博谋于众而授以位。这种民主制度，到秦以后便不复存在了。陈翼为认为，自鸦片战争以后，泰西诸国，接踵四裔，历史又面临一个重大的转折。如果在闭关时代，上虽专制，人民除了激而叛上，并无可以逃匿之处；通商以后，泰西以议院良制对中国专制，中国如不改设议院，仍以秦汉唐宋专制之法治之，那么，“民”势必为泰西“争”去。所以，议院之设，乃是因通商而出现的刻不容缓之急务。陈翼为也缕列了中国开议院的好处，即“去四害”“兴三利”。兴三利是吏治可振、财源可裕与人才可兴；去四害是抑大臣之弄权、去吏胥之积弊、绝官绅之私征与免狱官之害民。

许象枢的“七利”，归纳了甲午以前倡导开议院的议论；杨史彬的“十难”，汇拢了甲午以前反对开议院的议论；陈翼为的“去四害”，指出了议院制度对专制官场恶习有净化作用。三份课卷结合起来，可以看作是甲午以前中国民主思想发展的一个小结。

对于晚清思想史的演变脉络，学术界一般认为甲午战争是个转折点。张灏曾提出近代思想“转型时代”的论断，认为所谓“转型时代”，是指1895年至1925年前后大约30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期。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就前者而言，主要变化有二：一为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一为新的社群媒体的出现。至于思想内容的变化，也有两面：文化取向危机与新的思想论域。”

f 这一论断从总体上说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如果从思潮的酝酿、初涌、高涨到消退的不同阶段来看，则必须要注意到，在甲午以前，无论是对于仅仅师法西洋坚船利炮、声光化电的批评，还是对于君主专制的抨击，对于君主立宪的呼吁，在甲午战争以前，在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都已经颇具声势。本文所缕述的通过《格致书院课艺》所展现出来的上述内容，便是明证。换句话说，“转型时代”并非壁立千仞式的奇峰突起，而是蜿蜒而上的高原。从思想演变脉络、思潮涌动形态看，“转型时代”是有个量变积累的过程的。正是《格致书院课艺》展示的那些日后并无高位大名的众多普通读书人的思想水滴，汇成了日后“转变时代”的拍岸惊涛。

四、新群体努力与新网络推动

课艺是由命题人、答题人、选卷人共同创造出来的。

格致书院正课或曰季课，凡命题 36 次，出题 61 道。命题人主要为沿海各海关道台，包括设在上海的江海关道邵友濂、龚照瑗、聂缉槩、刘麒祥，设在宁波的管理浙海关的宁绍台道薛福成、吴引孙，设在天津的管理天津、塘沽、秦皇岛等海关的津海关道周馥、胡燏棻，设在烟台的管理东海关的登莱青道盛宣怀、李正荣，还有浙江布政使许应镠、江南制造局翻译傅兰雅、江海关税务司裴式模、轮船招商局总办郑观应，总共 14 人。近代中国海关众多，管理海关的道台很多，广州有粤海关，琼州有琼海关，厦门有厦海关，福州有闽海关，镇江有镇海关，格致书院为什么只是邀请管理江海关、浙海关、津海关、东海关的这四处道台作为主要命题人呢？这是因为，命题者既要在政治上认可书院的做法，又要在经费上能予书院以资助。课艺花红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命题人。晚清海关是比较富有的单位，机动经费较多。负责管理海关的道员，既管税收，又负责地方对外交涉，既有钱，又与洋务关系密切。请他们出面赞助，最合情理。上面这些命题人，大多是李鸿章关系网中的成员，或是与格致书院其他骨干成员关系密切的人。1886 年春、夏、秋、冬四季课艺命题人，江海关道邵友濂是李鸿章姻亲，宁绍台道薛福成、津海关道周馥都是李的心腹，先前都是李的幕僚，苏松太道龚照瑗是李的同乡、好友。第一年最要紧，四个地方将第一年四季经费承担下来，以后便相沿成例，即使具体人员有变动，但作为一个单位，继任者还是萧规曹随。当然，以后几年，这四个地方的历任道台，也多属李鸿章关系网中人，吴引孙、胡燏棻均系李鸿章安徽同乡，胡还是李相当倚重的亲信；李正荣是李鸿章表弟；刘麒祥是曾国藩好友刘蓉之子，也是李鸿章竭力提携的后辈。

格致书院特课始于 1889 年，止于 1893 年，连续五年无间断，春季由北洋大臣命题，秋季由南洋大臣命题。凡 4 人参加命题与鉴定，即李鸿章、曾国荃、沈秉成与刘坤一，命题 10 次，出题 25 道。其中，李鸿章 5 次，出题 15 道；刘坤一 3 次，出题 6 道；曾国荃 1 次，出题 3 道；沈秉成 1 次，出题 1 道。诸人都是当时中国热衷洋务的大员。北洋大臣、南洋大臣是晚清与洋务关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的地方大员，他们支持格致书院，亦属其职分所在。格致书院课艺中表达的许多见解，有些正是他们自己想说而不方便说的话。

上述命题人、阅卷人，有在国家层面上领导洋务运动的位高权重的李鸿章，有在实践层面上积极推动洋务运动进行的中层官员盛宣怀、邵友濂、周馥、胡燏棻、龚照瑗，有活跃在思想界、文化界的早已名满天下的文化人郑观应、王韬、傅兰雅、薛福成，共同构成了甲午战争以前中国力主变革的官僚与知识分子结合的豪华阵容。

自觉地利用新式媒体，为书院课艺的实施、传播助力。格致书院主持人王韬、傅兰雅都是主编报纸、杂志的老手，都很自觉地利用报纸、杂志为课艺服务。书院的每一次征文题目、评选结果，都在《申报》上刊载。王韬等还选择一批优秀课艺与阅卷评语刊登在《申报》上。自 1886 年至 1893 年，《申报》先后刊登课艺 19 篇，包括吴昌绶、王恭寿、瞿昂来的《中国创设海军队议》（1887.1.12—1887.2.15 连载）、李经邦的《潮汐应月说》（1892.4.28）等。许多文章后面还加有推介按语。1886 年 11 月 23 日，宁绍台道薛福成对于那年夏季课艺的所有批语，悉数刊登在《申报》上。与课艺有关的动态，《申报》也时常刊登，比如王韬与参加课艺学生的诗词唱和、通信，王韬为书院学生著作所写序言等。

《申报》之外，当时上海外侨所办的《万国公报》与《字林西报》，也被王韬与傅兰雅利用起来。

《万国公报》除了发布与课艺相关的信息，还至少刊载了 5 篇课艺。英文《字林西报》多次译介课艺题目，报道课艺进展情况。

课艺进行两年之后，1888 年初，傅兰雅在《字林西报》发表《中国文学与西方科学——格致课艺报告》，认为课艺很好地利用了中国人擅长撰文这一民族特色，促使他们对西方科学知识进行阅读、思考与表述，目的是使这些知识受到中国的理解、欢迎并获得应用。课艺进行两年了，现在看来，“课艺的成功超过了当初的预想，这使得格致书院的影响更远更广，使它不仅在知识分子中发挥了作用，而且在高级官员中也发挥了效应”。他认为，“总的来说，作为纯粹的实验，课艺是成功的，就像插入了一个楔子，最终会有助于仍待完成的伟大事业，即，打开这个国家的人民那迄今为止尚未开启的头脑和心灵。用西方科学各个领域的真理来启蒙他们。”报告评价课艺最初两年的发展态势，认为课艺进展平稳，规模逐渐扩大。“通过这种方式，格致书院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它还确保了与一些高级官员的合作关系，并在一些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引起了人们对西方观念的兴趣。”傅兰雅对于参与命题、阅卷的中国高级官员，以及他们所出的题目，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参与这项事业的各个高级官员显示出了当前中国需要的惊人洞察力。尽管他们的问题更多是关于政治经济和商业而不是关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人们依然会满意地看到他们多么爱国，看到他们从实用的、功利的观点而不是仅从理论上来看待知识的态度”。

《字林西报》持续报道、评论书院考课情况，刊登考题的英译文本。西人对于李鸿章的表现尤为赞赏，认为李所出的题目，要求应答者具备丰富的化学和电学知识，“这是开明的高级官员们渴望推动西方科学的例子”，并认为李的参与，极大地提高了课艺的吸引力，“每一个有这方面知识的人都渴望得到这位政治要员的青睐”。1893 年春，聂缉槩给书院出了两道题，一道是进行中西语言文字比较，另一道是关于慈善问题，两题都要求学生同时关注中西的历史与现状。《字林西报》对这两道题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从中可以看出聂缉槩以及他的同胞对获得更完整的关于西方事务的知识充满渴望，这值得称赞。

《申报》《万国公报》发布课艺题目，刊载课艺评语，评论课艺优劣，选登优秀课艺，不是简单地介绍格致书院的工作与学生的写作水准，而是在传播此类新知识、新观点，在天南地北、成千上万的茫茫读者中寻求同调，形成新的联系网络，建构新的文化共同体。

这些应试士子，有些人本来已经学有所成，颇有名气。比如，钟天纬 1872 年就进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1875 年应徐建寅之邀，参与筹建山东机器局；1880 年应驻德公使李凤苞之邀，随使德国两年，回国以后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多年，参与过《西国近事汇编》等多部西书的翻译，参与过多项洋务企业的活动，是西学素养相当丰厚、对西学确有真知灼见的人。再如，赵元益本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员，参与翻译西书多种，后来又成为格致书院董事，本文前面已有介绍。这些人本来就是中国援引西学、兴办洋务的积极践行者，他们撰文参考，提升了应试士子的西学档次。

应试士子中，年纪最大的，应数沈毓桂。此人 1807 年（嘉庆十二年）出生，江苏吴江人，开埠初期就来到上海，协助艾约瑟、伟烈亚力、慕维廉等西人译书，1868 年起被林乐知聘为《教会新报》（后改名《万国公报》）中文编辑，为林乐知主要中文助手。1881 年协助林乐知创办中西书院，任中文教习。他开始参加格致书院考课的那一年，1889 年，已是八十有二的耄耋老人，比王韬还大二十多岁。1889 年秋季特课中，他写的《铸银币得失说》《圣人有四府论》两篇大作，均获得超等第九名；1889 年秋季正课，他获得特等第十名；1889 年冬季正课，他获得一等第十五名；1891 年春季正课，他获得一等第二十二名。令人遗憾的是，《格致书院课艺》仅将那些超等、特等、一等前三名的作品刊登出来，他尽管获得嘉奖，但其课艺今人难以得见。不过，《格致书院课艺》不载，他自有办法。他在自己主持的《万国公报》上，将《铸银币得失说》《圣人有四府论》二文发表出来。

通过考课使得自己的学识为社会所认可，得到包括北洋大臣、南洋大臣、道台大人等这些官员的赏识，得到王韬这样著名学者的肯定，这对于士子来说是巨大的精神鼓励。一如傅兰雅所说：“荣誉和引起公众的注意比实际的奖赏——银子从十两到半两不等——更能激励他们。实际上很多中国人都是通过优秀的文章和丰富的常识来引起官员注意的。”

格致书院以西学和时事命题课艺，与一般书院大为异趣，加上北洋大臣、南洋大臣等热心时务的官绅登高倡议，《申报》《万

国公报》与《字林西报》的持续宣传，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反响，“远近名流硕彦，闻风兴起，彬彬称盛”。

特别要指出的是，当时格致书院并没有固定的常日制学生，参与格致书院课艺的学生，并不像当时许多书院那样（如江阴南菁书院、杭州诂经精舍），学生住院肄业，而是通过报章、杂志、信件与书院发生联系。他们大多数是看到报刊上登载的题目，然后答题作文，将课艺寄给书院。课艺等第评出来以后，也是通过报刊发布信息。有些优异的课艺与评语也在报纸上刊出。

来自全国各地的应试者，大多数人原先与格致书院没有什么联系，与王韬等人更是未谋一面。通过由报刊形成的媒介与网络，通过课考，他们与格致书院有了联系，成了书院的肄业学生。有些士子还与王韬建立了密切的师生关系。杭州士子项藻馨的课卷，7次获奖，包括1891年秋获超等第一名，终生对王韬感恩戴德，一口一声“弑师”。1894年，他特地到上海看望王韬。这是他第一次到上海，也是第一次见到王韬。

最典型的是殷之辂。他是南京人，家境贫寒，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但博览群书，关心时事，确有才学。他从报上看到格致书院考课广告，便撰文应征。结果，考中1886年秋季超等第十名。名单公布出来，他喜不自胜，特地写信给王韬，描述自己的心情。他感谢给自己展示才华提供平台的格致书院，感谢慧眼识珠的王韬。他还写了一首《长歌》，发表在《申报》上。这一年，殷之辂50岁。此后，他成为格致书院考课最为积极的参与者之一，共有二十多篇文章获奖，得奖的名次从超等、特等到一等都有。1893年秋季正课，他获超等第一名，课卷在《申报》上发表，王韬特地在文后加按语：“殷君深悉洋务，精通算术，品学兼优，屡列超等，为人恳至朴诚有足多者。”

课艺出版后，由傅兰雅主办的格致书室寄售，并在《申报》上刊载销售广告。

在王韬等人看来，将课艺刻印出版，可以起到知识传播作用。将书院课艺汇集出版，是中国书院一大传统。康熙年间，安徽怀宁就出版过《培原书院会艺》，湖南长沙出版过《岳麓试牍》。嘉道以后，汇刻书院课艺成为普遍现象，杭州的《诂经精舍文集》，苏州的《紫阳书院课艺》，扬州的《广陵书院课艺》，天津的《会文书院课艺初刻》，都是此类文集汇编。在这个意义上，《格致书院课艺》的出版，也是接续了中国书院的传统。

瓦格纳、黄旦等人的研究，已经论述了《申报》《字林西报》作为交流网络，构成中国社会上下沟通、社会平面沟通的公共空间。《格致书院课艺》的现象，其实是王韬、傅兰雅等人，在已有的报刊网络上，嵌入中国传统的书院空间。中国传统书院，不乏议论朝政的先例，黄宗羲曾专门谈过这个问题。通过《申报》《字林西报》网络，嵌入中国传统书院的形式，便形成以近代新媒体网络为基础、以书院传统为内涵的新的文化网络。

任何媒体传播总是与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有关。传播、接受、回应，永远是紧密联系、无从切割的。《申报》发布课艺题目，刊载课艺评语，评论课艺优劣，选登优秀课艺，不是简单地介绍格致书院的工作与学生的写作水准，而是在传播此类新知识、新政见，在天南地北、成千上万的茫茫读者中寻求同调，形成新的联系网络，建构新的文化共同体。

由报刊、课艺形成的网络的作用是双向的，学生通过报刊获悉课艺信息、参与课艺写作；书院通过课艺，荟萃西学知识，汇集时务新见；那些命题、阅卷官员则通过课艺，获得读书人对洋务新政的舆论支持，也发现了一些洋务人才。钟天纬因课艺杰出，被盛宣怀邀请到山东协助筹办矿务学堂、试铸钱币以及勘估矿产等，还被张之洞邀请到汉阳帮助勘察矿产。杨毓辉因课艺出众，被郑观应邀请助理编辑《盛世危言》，多篇课艺论点被郑观应引用、转录。其余多名课艺参加者，如叶瀚、储桂山、项藻馨等，日后都成为颇有影响的新学人才。叶瀚1893年任湖北自强学堂教员，后担任《蒙学报》总撰述；储桂山后为南洋公学特班生，编有《新时务通考》（1902）、《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1903）等书；项藻馨主办《杭州白话报》（1901—1904），任杭州安定学堂监督；许克勤担任《蒙学报》撰述，瞿昂来出任中国驻英使馆翻译，陈汉章任北京大学教授。

《格致书院课艺》是晚清沿海城市新式群体有组织、有计划地生产出来的知识产品，也是开放的、没有院墙的、没有地域

限制、没有应试对象限制的全国性的西学研究与时事时论的知识产品。其最大政治台柱是北洋大臣李鸿章，中坚力量（也是主要出资人）是驻扎在上海、天津、宁波、烟台四个通商口岸的地方道台，内以盛宣怀最为重要，学术导师是王韬、傅兰雅、郑观应等居住在上海的通晓西学的知识分子。王韬与傅兰雅共同策划选题，王韬负责联络官府与产品最后组装，傅兰雅负责对外宣传。主要生产人员是以江浙等沿海地区为主的、留心西学的读书人。他们按照书院指定的课题，固定的规格，提供相应的产品。作为命题人兼阅卷人的各级官员与山长王韬，通过对产品的验收、点评、包装，然后销售到社会上去。作为终端产品的课卷，先是逐年分卷销售，最后再汇集成套出售。《申报》《万国公报》与《字林西报》都承接了这一产品的广告业务。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知识生产流程。

作为一项知识产品，《格致书院课艺》尽管各篇课卷自成一体，风格各异，有的深刻，有的浅近，有的激进，有的平和，各篇观点也未见得一致，甚至有很大分歧，但它们整体风格还是相当明显的，即政治上反对西方侵略，主张革新，主张富国强兵；经济上主张对外开放，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民族企业，发展民营经济；文化上批评守旧，批评科举制度，倡导新式教育。这集中反映了当时沿海地区开明官绅的主张。

作为出自众手的知识产品，《格致书院课艺》的主要素材，来源于此前业已存在的西学资料，包括明末清初利玛窦、徐光启等人的西学译作，鸦片战争以前马礼逊等人在南洋的西学资料，鸦片战争以后由传教士、中国官办翻译馆、同文馆等各种机构，以及各色来华外国人、到外国去的中国人所产生的西学资料。那些资料原本是由不同主体、不同途径、出于不同目的、以不同方式而产生的，散处各地的应试士子将其搜集、汇拢、梳理、加工，使其成为新的产品。课艺出现的历史时期，正好是中法战争以后、甲午战争以前。那是洋务运动经受一场较小风暴袭击以后、一场更大风暴尚未到来之际，是洋务运动原本充满希望、突然遭受灭顶之灾的前夜。诚如刘世龙所言，在早期改良思想家著作大都未加刊行的情况下，格致书院课艺的逐年刊行，本身就是对维新变法思想的有力宣传。“如果说，维新变法在中法战前还只是几个改良思想家孤寂的呼喊，那么中法战后，由于这批知识分子的响应，则形成一股声浪。九十年代初年更汇成了初有气势的社会思潮，且有取代洋务思潮的明显趋向了。”甲午以后，以救亡图存为号召的全国性变法运动洪波涌起，全社会对于西学知识的需求空前加大，《格致书院课艺》正好赶上了这一轮西学需求热潮。课卷中蕴涵的那些西学知识、变法主张，成了维新运动的精神快餐。形形色色的经世文编、时务通考、新学大成里，随处可见出自格致书院的新学知识、变法思想。王韬、傅兰雅等人压根儿没有想到，《格致书院课艺》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竟然充当了西学知识与变法思想的蓄水池，产生了那么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葛士浚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续编》（1888），盛康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续编》（1897），各收录过格致书院的课艺 1 篇，麦仲华的《皇朝经世文新编》（1898）收录过 2 篇，储桂山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1903）收录了课艺中讨论铁路、邮政、边患的文章多篇。参见刘明：《格致书院课艺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2015 年。

上海格致书院系近代中外合办的学校，创办于 1876 年，1911 年停办，历时 35 年，凡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76—1884 年，院务主要由徐寿主持。第二阶段，1885—1897 年，院务由王韬负责。第三阶段，1898—1911 年，院务由赵元益、潘慎文等相继负责。《格致书院课艺》产生于王韬主持院务的第二阶段。

王韬（1828—1897）是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的文化名人，18 岁中秀才。1849 年赴上海，受雇于墨海书馆，帮助传教士润色文字，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知识。1862 年，因被指控化名向太平军官员上书献策，遭清廷通缉，逃往香港。他在港助西人译书、办报凡 22 年。到 19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已是名满天下的宣传家、思想家。1884 年，经盛宣怀等人斡旋，获李鸿章默许，回到上海。

王韬担任监院，并无专门薪水。为了支持他的工作，盛宣怀自光绪十三年起，私人每月资助王韬银二十两，另从其主管的轮船招商局公款中，每月给王韬支取干修银二十两。参见王尔敏：《王韬生活的另一面——风流至性》，《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5 年

第 24 期。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序言》，《格致书院课艺》（丙戌年）。对于考课的发端，钟天纬说是他向王韬建议的。其年谱记述：“公言于王（韬），仿书院之制，兴文课，以提倡多士，广开声气。请地方大吏以格致命题，一岁四次，春秋两季为南北洋大臣特课。于是四方风动，群彦云起，实为日后维新之基。”参见《钟鹤笙征君年谱》，钟天纬、钟镜英：《别足集》外篇，附录，1932年。对于此说，未见其他佐证材料，王韬亦未提及，附记于此。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序言》，《格致书院课艺》（丙戌年）。

《格致书院拟以艺文考试章程》，《申报》1886年2月13日。

1895年冬季正课、1896年秋季、冬季正课以及秋季特课皆未举行，1897年只举行了冬季正课，1898年四季正课正常举行，但特课均未举行；1899年四季正课虽正常举行，但秋冬两季皆未出案，特课亦未举行；1900年只举行了春、夏、秋三季正课，且只有春、夏两季正常出案，特课皆未举行。

比如，薛福成评论1886年夏季超等第三名王恭寿《中国创设海军议》的课卷，肯定其“留心舆地、机器、测绘等事，实为当今第一要务，所议均能推勘利病，确为有心得”，但同时指出作者所引资料、地图，很多属于旧的版本，已落后于现实形势。见王恭寿课卷，1886年（丙戌）夏季超等第三名。再如，王韬评价己丑春季正课超等第二名车善呈的课卷：“敷陈诸学，贵在词句简炼，意义赅括，详者未免失之冗芜，略者未免挂一漏万，不克尽其词。此卷虽未能绝去诸弊，而命意遣词，尚少支蔓”。见车善呈课卷，1889年（己丑）春季正课特等第二名。

郝秉键、李志军：《19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钟天纬课卷，1889年（己丑）春季正课超等第三名。龚照璠评价此课卷：“于西人各学，皆能疏通而畅达之，笔致亦简洁明净，绝去支蔓，允推合作”。王韬评价，“作者于西学已自入门，能窥其大要矣”。

有关课艺所介绍的科学知识评价，参见尚智丛：《1886-1894年间近代科学在晚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上海格致书院格致类课艺分析》，《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郝秉键、李志军：《19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沈立平：《〈格致书院课艺〉中的科学内容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